

笔会

『绕过工业时代』

曹景行

中等规模的县，面积却有三万八千多平方公里，比咱们近千万人口的海南岛还大一点，而且都是崇山峻岭。可以说，有史以来，手机第一次将他们如此密切地连成一体。据新加坡《联合时报》2014年的一篇报道，不丹七十多万人口中已经有五十五万手机用户。《不丹人》半月刊编辑勒桑格说：“不丹从封建时代跳到现代，绕过了工业时代环节。”不丹首相托杰相信技术力量不可抗拒，他说：“技术不是破坏性的，它很好，有助于不丹繁荣。”

但封闭社会一旦被打破，“外面的世界真精彩”，也必然带来难以预料的变化。今天的“不丹就在这样的变化中。想到电视和电脑、互联网进入不丹要比其他国家晚好些年，我就问导游白马：“开始的时候，不丹人对手机有没有什么抗拒、抵制？”回答是：“没有啊，为什么要抵制？只是这两年更加流行起来。”他用的手机是新出不久的苹果6s，时髦的土豪金颜色。

最令我意外的是寺庙里面，身披袈裟的大小喇嘛似乎都已离不开手机。在旧都普那卡宗堡为小王子祈福的盛大法会开始前，散在各处等候的喇嘛们不少都在看手机、玩手机，小喇嘛则是三五成群围着手机刷屏。我在大殿对面的二楼走廊里遇到一群年轻的喇嘛，正等着召集。靠栏杆的长条凳子上并排坐着三个，每人都在专心摆弄自己的手机。就连那位威风凛凛带动响鞭召集僧众的紫袍喇嘛，见到门口的游客就双手合十打招呼。有人要同几位年长的喇嘛在台阶上合影，他们都乐意答应。旁边匆匆走过的年轻喇嘛，纷纷从袈裟里面掏出手机打起电话，有的干脆到一边坐下刷网……

同其他地方一样，手机已经成为不丹寺庙里喇嘛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他们同外界连接的渠道。那么，本来应当远离红尘俗世而静修的僧人都开始刷屏，究竟是更加有助于弘扬佛法，还是会给他们内心带来不安？更加令我好奇的，是喇嘛们每天刷屏究竟看些什么？只看有关宗教信仰的，还是也看许多世俗的东西，看哪种东西更多一点？我没有机会问他们，也怕问了让人家尴尬。

手机在不丹这样一个曾经长久封闭的国家究竟会起到怎样的作用？会不会让千年传统加速风化瓦解？这是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尤其是“不丹”年轻一代，也就是今天玩着手机长大的一代，必然会遇到更多来自外部的影响和冲击。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女孩桑姆从另一个角度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当然不希望发展的代价是要牺牲我们的美丽家园，但据我所知，无论这里的年轻人到多远地方留学，看到了多少花花世界，许多人最终还会选择回归家园，说到底，还是自己的家好。”

但对于今天的中国人，上网已成为基本生活需求，游客不管到了哪儿，第一件事大概就问有没有wifi，密码是什么。所以，当飞机在不丹唯一国际机场帕罗机场降落时，休息了一会儿，知道当地导游白马会带我们去电信公司办不丹的手机卡，“可以打电话、上网”，大家都难免有点惊喜。

不丹城市街头几乎所有的房子都一个样式：白墙，彩绘屋檐、门廊和窗框，红或黄色屋顶。我们面前也是如此的小小一幢二层楼房，若不是前面墙上挂着不大的一块绿色牌子，旁边院子里竖着不高的一座信号铁塔，很难想到这儿就是做电信服务的。进去后又看到柜台后面堆着高过人的文书档案，马上想起印度公家机构拖拖拉拉的办事风格，不免有点担心。

意外的是，穿着“帽”服的办事人员很利索地帮我们一行十多人换好新的手机卡。有的是大卡，有的是小卡，只有我的手机要换中卡，排在最后一个，也没有问题。记得是每人300努，约合人民币三十元。让我们略感遗憾的是，第二天我们手机上都收到一条不丹电信公司的信息：“为了庆祝小王子今天诞生，手机充值赠送同等金额！”唉，小王子早一天出生多好！

实际上，我们见到用手机的第一个不丹人，是在曼谷飞帕罗的不丹皇家航空公司客机上。一对年轻夫妇带着两个男孩坐第一排，大的十岁出头，小的七八岁，中途，孩子妈妈就拿出手机给他们拍照。飞机穿过山口俯冲直落帕罗机场，跑道上已经铺起了红地毯。我们问空姐怎么回事，她们说是迎接王妹一家。原来如此，之前已有王后快到产期的消息，看来王室成员正赶着回来呢。

我们出了电信公司到了帕罗街头，对面过来几位身穿“旗拉”（女性国服）的年轻女子，手上都拿着手机，对面街头四位男青年围着聊天，有的正在刷屏。一路过去，看到好些行人边走边用手机打电话。除了老年人，不丹人用手机的还真不少！

最能表明手机普及程度的，应该是街边墙上的一张不丹本地电影的海报。电影名叫《SMS》，内容讲新老两代人的冲突，两位年轻主角都穿着国服但打扮时髦，男的戴墨镜，女的化浓妆，分别呈现在左右两只新款苹果手机的屏幕上。

不丹人用的手机当然都是进口货。新款智能手机不便宜，一位导游说他刚托朋友从香港带了一只新版苹果手机，花了一千美元。能够用上新手机，大可在年轻朋友中炫耀一番。在新年早上做法会的岗提古寺，在为小王子诞生举行庆祝典礼的旧都普那卡宗堡（宗堡是地方上政教合一的权力中心），都看到年轻人围在一起摆弄新手机，无心旁顾。

不丹已不再是高度封闭的山地小国，手机，比什么都更能说明不丹的今天。除夕晚上在东部岗提谷地的一家精品酒店大堂，我们一边享用着大厨特别为我们中国客人准备的年夜饭，一边用手机同国内亲友相互拜年。关于“春晚”的各种评论如潮水般涌进我们的微信，让人几乎感觉不到几千公里的距离和两小时的时差。

不丹七十多万人口相当于中国一个

跨过这个年，姜德明先生就到米寿之年了。在我印象中，他一向很平和、很平实，也很平常。他虽编文艺副刊有年，广交天下文人；虽藏书过万，写有无数文章，但从未爆大名，未跻身拍卖场，未发大财。也许他太老派：孜孜矻矻编文，低音低调写文，自得自乐淘书；讲话不高声，表情总是温良，学问扎实可靠。总之，在他身上，看不到一点市场经营、商业社会痕迹，连藏书业内、文坛圈里，也鲜有忘记他——尽管在这两行，他都是高手。

2010年9月14日，范用先生去世；11月3日，我收到姜德明一纸便条：“家明同志：我写了一篇怀念范用先生的短文，已交上海文汇报书周报。特复印一份供您参考，或可收入纪念册中。”当时，我正组稿、编辑《书痴范用》。像范用这样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活跃在中国文化界的文化人，姜德明几乎都有深的交往。不用说叶圣陶、巴金、夏衍等前辈，也不用说赵家璧、许觉民等编辑出版同行，更不用说唐庚、董桥、陈子善等淘书同好，其他如丁聪、李健吾、卞之琳、邵燕祥、董鼎山、赵清阁、王治秋（这个名单写下去可能要几十页）……与这些人的交往塑造了姜德明整个人生。这种交往是非功利的，是君子之交，淡淡的，纯粹的，不见如见，绵延不断。

我与姜德明先生交往，始于1996年。那年，我和徐城北策划了一套“杂家杂忆丛书”，前后出了八九种，其中，姜德明的一本名为《文林枝叶》。这套丛书的编辑说明中说：“杂家和杂学是如今一大特色。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必有博学广闻的杂家涌现。他们的学问涉及各种学科，并能融会贯通，互相映照；他们的文章知识性、可读性强，学术和思想内容丰富鲜明；他们回忆文坛、学界、艺苑乃至自家往事，写种种掌故逸闻，发点点感喟幽想，篇幅肯定是较小的，形式肯定是灵活的，并尽量配发照片图画。不期望读者正襟危坐读它，尽由好书者无端翻阅，在断断续续之中、有意无意之间，书，或许已经读完了。这就是‘杂家杂忆丛书’所追求的境界。”姜德明认同我们的想法，来信说“实在大获我心”，很快发来稿件。

《文林枝叶》共收散文六十篇，

难忘的书与人

约略为三部分：人物记事、书的美术、掌故小品。其实都称之为掌故也无不可。这些文章曾发表在报刊杂志上，他说，“提笔时总还想到对方版面的需要，想到自己的文章应该放在版面上的什么角落……倘以个人的微力能使对方的版面杂一点，我便感到十分愉快。这肯定是职业病在作怪”。其中有比较沉重的话题，比如《周扬与夏衍》一篇。多年来，对周扬的争议文章不少。可是上世纪70年代末，夏衍谈到：“处在那种情况下周扬也难啊！”姜德明就此写道：“人是复杂的。我对两位一样地尊重、同情”——这种观点可看出他的厚道，也是他们那一代人与后人不同的地方——姜德明1951年进入人民日报社编文艺副刊，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

《箴言》一篇，收录了柯灵给他的信：“对有些人品书品，是否可以更直率些？……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看法完全正确，可贵的是把自己看到的感到如实地表达出来。就我看到的大作来说，都有一种温柔敦厚的气质……”姜德明认为这是柯灵对自己委婉的批评，检讨说“我的散文，虽然不讲假话，追求朴素，明显的弱点是拘谨平实”。也许是这个原因，在本集中，常看到作者力图写得活泼一些、幽默一些、灵活一些的地方，文章因之多了一些变化。比如看望曹靖华那篇，名之为《火》，开头一行是：“我悄悄走进他的病床”……《想见冰心》一篇的写作手法像是手记，一小段一小段的，每段内容并不连贯，跳跃着，开头很直接，甚至有些突兀：“到父亲开的纸店去。我在店内新收购来的几麻袋旧账册中，找到了几本可读的书和画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上海的《良友画报》。啊，那上面有冰心……”“多么动人的《一只木屐》呀……”“七八年前吧……”读来轻松，文字有节奏，感情涌流其

书坊归来

汪家明

《文林枝叶》出版后，姜先生对多用图片、设计美观以及米黄色胶版纸大加赞赏，甚至说：“至少在这以前出版的书还没有达到这一标准的。”（1997年11月7日来信）

还在“杂家杂忆丛书”约稿组稿之时，我又开始筹备“书梦重温丛书”了。1997年1月29日（腊月二十）晚间，我在北京东四北大街阿静斋餐馆与沈昌文、潘国彦、陈丹晨、顾骥、金宏达、于青等便饭并讨论丛书主旨和形态：

凡有成就者，在青少年时代乃至生命的每一阶段，都读过各种各样的书；文学艺术、哲学、科学、童话乃至小人书……这些书给了他们重大影响，留下了一串串书梦……撰写者在重温书梦时，可以一本一本道来，每本写几千字几千字均可，每本书在出版时配一原版本的书影。这样，几十种书的回忆，便可成一册，约七八万字，三四十幅图。写作内容可包括怎样读这本书、书的来源、版本，书中最令撰稿人感动的故事、人物，对撰稿者在思想和情感方面的影响等……

谈到约作者，诸君首推姜德明。此前他已出版多种谈书的集子，而且仍在源源不断发表书话文章。他自己说：在家写书话，出门写散文——写书话必得翻阅原书和查找资料，在外写作不便。从中学时代，他就常去天津劝业场逛书摊，日子久了，买书多了，遂被称为藏书家。据说前后六七十年，共淘得民国现代文艺书刊万余册。他说自己“得个爱书家的荣誉已经不错了”；“理想的爱书家是藏用结合，最好有个范围，而且目的不是为了增值或拍卖”。他所谓的“用”，大概就是写一些玩玩味、又含研究的书话文章？

由于有此前的合作，姜先生爽快允约。新书名为《书坊归来》。很巧，

文章仍是六十篇，分为“书边草”“杂志抄”等四部分。“每题一图，除个别篇外，全部都是初次结果，有的还不曾发表过”。在书的封底，印有这样一段文字：

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每从书坊归来，手携几本淘来的残书，步履总是那么轻快，急于赶回家去。在这样的日子里，他晚上总是睡得很迟。夜深人静，小心地擦拭和修整重读一本本残书，摩挲再三，不忍把眼睛稍稍离开……这是一种什么境界？旧书，在真正爱书家眼里，之所以是宝物，并非爱其金钱价值，而是重其文化历史价值，是埋藏于其中的往日的风景。读《书坊归来》，就是在读这样一种境界。

概括说，全书都在讲述一本本老书旧书背后的故事，细分缕析，文笔与《文林新叶》稍有不同，展示更多的是博学和融会贯通，而不是思想感情。作者收藏的《野草》，是十二岁时一位并不熟悉的西装青年赠与的，后来才知道，一版一印封面署名“鲁迅先生著”，鲁迅以为不妥，二印以后改为“鲁迅著”；《莎乐美》插图引进中国，起初画家比亚兹莱被译为“琵琶词侣”——如此古雅的译笔来自田汉……印成于1928年的齐白石诗集《借山吟馆诗草》是从成堆杂书中检出来的，混于其他零册一起交给店家，店家一本本登记，到这本，凝视良久，放一旁说：“封面上有齐白石题字，不卖。”姜德明满不在意地说：“什么齐白石的字，你再看看，假的！”店家重新拿起来再三端详，终于开了发票，说：“算了，真是假卖给你吧。”姜德明心中暗喜：哪会是假的！这本石版影印诗集本就罕见，加之有齐翁亲笔题字，真是意外之得啊——读到这里我笑了，忠厚如姜公者，也会与书商斗心眼，而且高明！

姜德明对民国版本的博学，我有亲身体会。多年前，朋友送我民国二十年（1931）一版一印的保罗梵乐希（瓦雷里）诗集《水仙辞》，梁宗岱译，竖排宣纸筒子页线装。一次偶然说起，他告诉我：这书他和北京图书馆都有，但品相一般，而我的收藏品相九成，难得……

姜德明写作勤勉，著作不下二十余种，我有幸编辑出版其中两种。其实还有两种，《插图拾翠》和《作家百简》，本来是与约约定的，但被别人“抢走”。前一种的“抢主”是三联书店：

家明兄：
两周前范用先生与三联总编室主任来舍下，要求我已允由贵社出版的《插图集》交他们出，以与《封面集》（三联书店《书衣百影》——汪注）配套。我婉拒再三，他们仍不允，只好答应他们，容与你联系后再定。我想你就概允了吧！

姜德明 3.24 (1998)

想不到的是，几年后，我调到三联书店工作。《插图集》名为《插图拾翠》出版于2000年，我就近得到编者的签名本及本店样书数册，不亦快哉！

2017年1月21日



手机已经成为喇嘛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曹景行摄于不丹。

回音壁

3月4日“笔会”刊方益助《女学先驱总教习》一文，让读者认识了“女学先驱”金韵梅。金韵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西医、第一位医院女院长，还是第一位女留学生。

近代最早的女留学生，除了金韵梅，还有江西女子康爱德、福州许金钊和湖北石美玉，她们三人也先后得到传教士的资助而留美。

关于金韵梅的身世，《女学先驱总教习》一文重点介绍金韵梅大学毕业后的情况，对她的早期生活鲜有涉及。这里稍作补充——

金韵梅（1864—1934）出生于浙江宁波一个牧师家庭，两岁半时，她的父母因病相继去世，金韵梅被父亲生前好友、美国传教士麦嘉谛收养。后来，金韵梅随麦嘉谛辗转美国和日本，接受了启蒙教育。1881年，金韵梅正式赴美，进入纽约医院附属女子医学院学习，她是当时该校唯一的中国学生。

近读《〈八十日环游记〉首部中译本及早期女翻译家》（刊3月7日“笔会”），文中写到1900年薛绍徽和陈寿彭合作翻译儒勒·凡尔纳《八十日环游记》出版后，受到很多中国读者欢迎。

儒勒·凡尔纳是19世纪法国著名科幻作家，他的作品传达出人类探索未知的无限热情，激发人们追求梦想。在薛绍徽和陈寿彭合作翻译《八十日环游记》之后，中国有不少译者精心翻译了凡尔纳作品。

1902年，梁启超在流亡地日本创办了《新小说》，并依据森田思轩的《十五少年》和罗善合作翻译了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十五小豪杰》是一部少年文学，梁启超被书中西方少年不畏艰险、同舟共济的精神打动，认为这本书可以“开发本国学生的志

近代最早的女留学生

江立

许金钊（1865—1929）出身于基督教家庭，她的父亲思想比较开通，认为女孩也该接受良好的教育。她先在福州教会女塾就读，后转入教会办的福州妇女医院学医。该院院长对她很是喜爱，为她申请到去美国读大学的经费。许金钊先后在俄亥俄州的威思林大学和费城女子医科大学学医。

康爱德（1873—1931）是江西九江人，刚刚来到这个世界，她就遭到了家人嫌弃。因为在她之前，家里已经有了五个女孩。期盼生儿子的父母将她送给了邻居家。这户人家请人算

命，算命先生说康爱德将给这个家庭带来厄运。只有几个月大的小爱德即将被抛弃时，美国女传教士吴格矩收养了她。康爱德在这位传教士家中长大，并在吴格矩和另一位女传教士哈欧欧主办的一所教会女塾读书。九岁那年，她随吴格矩到了旧金山，读了小学和中学，学会了数国语言，并学习了天文、算法、绘画、音乐等，后随哈欧欧回国。

1892年，哈欧欧带康爱德另一位中国女子石美玉（1873—1954）以及三个中国男孩一起前往美国，进密西

根大学学医，1896年毕业回国。

与康爱德在九江教会女塾同窗共读后又同赴美国留学的石美玉是湖北黄梅人。她出生在一个教民家庭，她的父亲主持九江的一个小教堂，母亲主办一个规模的女塾。

近代中国最早的四位女留学生，无论在国外留学期间还是学成归国以后，表现都很出色。金韵梅1887年曾在《纽约医学学报》上发表论文；1888年金韵梅回国后，在厦门、成都等地，一边行医一边传播国外的医学知识和技术。1907年，她在天津设立

凡尔纳的中译本

康平

他准备乘这颗炮弹到月球去探险。鲁迅的这一译本，于1903年12月在日本东京印刷发行。

《地底旅行》（现译《地心游记》，好莱坞还据此拍了两部《地心历险记》，于2008年和2010年上映）写的是乘得布洛克教授和他的侄儿阿克赛在一位向导的帮助下，经由冰岛一个暂时沉寂的火山口，沿岩石中的洞穴而下，历尽艰险，终于抵达地心，

最终奇迹般经由一次火山爆发，从地中海那边另一个火山口喷回到了地面。鲁迅这一译本1906年4月在日本东京印刷，由南京启新书局和上海普及书局发行。

鲁迅之所以对翻译凡尔纳的作品抱有浓厚的兴趣，那是因为他“向科学学，所以喜欢科幻小说”（鲁迅致杨霁云1934年5月15日）。在翻译《月界旅行》时，鲁迅发出这样的感叹：“中国人做梦梦的是金榜题名，洞房花烛，而法国人却在幻想征服月球。”

“五四”前，儒勒·凡尔纳的中译本大约有十五六种。除了梁启超和鲁迅的译本，还有一些译本值得关注：1902年，卢藉东、红溪生译了《海底旅行》，1904年包天笑译了《秘密使者》，1905年奚若译了《秘密海岛》，

1906年周桂笙译了《地心旅行》，1914年叔子译了《八十日》……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再度受到译界关注。1957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周熙良译的《天灯灯塔》。1957—196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凡尔纳的科幻小说译本，包括范希衡译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王汶译的《气球上的五星期》，曾觉之译的《海底两万里》，杨宪益、闻时清译的《地心游记》等。

197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首先重版了以前出版的凡尔纳小说，然后组织译者继续翻译，出版了《凡尔纳全集》。与此同时，其他多家出版社也陆续出版了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在八十年代又一次形成了“凡尔纳热”。